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 促进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基于2014—2020年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 857户家庭7期追踪数据的分析

侯学博, 李现康, 张蚌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杨凌 712100)

摘要: 通过构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动态理论模型, 探析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效应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4—2020年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857户家庭的追踪数据, 验证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有效促进了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和跨区域就业。政府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协助对接企业就业等措施, 有效促进了搬迁前无非农就业经历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增加和非农就业地点变化。机制分析发现, 农业特色产业扶持、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定向劳务派遣、组织招工会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促进家庭非农就业占比的政策效应中存在中介效应。研究提出, 应当针对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群体分类开展就业创业扶持, 着力稳定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群体就业规模。加强公共服务与后续扶持政策结合, 助力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群体更好地实现经济融入。

关键词: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非农就业成本; 非农就业机会; 职业技能培训; 多期DID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旨在将原本陷入空间贫困陷阱的贫困人口从原有生存环境中脱离出来, 以彻底阻断贫困产生的根源。到2020年,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第一阶段工作已全面完成, 960多万贫困人口依靠易地扶贫搬迁成功脱离了空间贫困陷阱, 开启了新的生活^[1-3]。然而, 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搬得出”只是第一步, 如何避免安置群众陷入移民贫困陷阱, 激发安置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通过后续扶持协助其实现“换新业”, 成为中国“十四五”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重要议题^[4,5]。为此, 国家自2020年起连续多年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问题出台相应指导意见, 聚焦于原深度贫困地区、大中型安置区安置群众非农就业问题, 从就业岗位、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出台各类政策和指导意见, 以期实现“稳得住”“逐步能致富”^[6-8]。然而, 由于易地扶贫搬迁群体人力资本匮乏、社会关系重塑和县域经济发展的乏力,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群众特别是离土安置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以下简称“集中安置”)群众经济融入难度进一步增加^[4,5,9,10]。因此, 如何稳定劳动力非农就业, 实现集中安置群体经济融入, 厘清集中安置的就业促进效应与机制尤为重要^[4,11-13]。

收稿日期: 2023-08-28; 修订日期: 2023-11-22

基金项目: 陕西省农业协同创新与推广联盟2022年软科学项目(LMR202203)

作者简介: 侯学博(1998-), 男, 湖北恩施人, 硕士, 研究方向为易地扶贫搬迁群体经济融入与生计转型。

E-mail: hxbxjau@outlook.com

通讯作者: 张蚌蚌(1990-), 男, 河南太康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耕地质量与土地评价。

E-mail: bangbang.zhang@nwafu.edu.cn

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因安置方式决定的特殊性。作为一项复杂的民生改善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而集中安置又分为村内安置、产业园区安置、移民新村安置、城镇安置、乡村旅游安置等^[14]。不同安置方式对家庭生计方式、社会关系和集体关系、公共服务成本等因素的变化影响不尽相同^[15,16]。集中安置会促使家庭不得不重新选择生计方式与生计来源,稳定的非农就业对集中安置家庭而言十分重要^[5]。因此,在移民安置时期,协助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地方政府协助集中安置家庭摆脱移民生计贫困的主要措施^[17,18]。部分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对家庭收入影响的研究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易地扶贫搬迁后,安置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由农业收入转向非农收入^[19,20]。通过稳定集中安置家庭非农就业规模与非农就业收入,在促进集中安置家庭、帮助贫困群众摆脱空间贫困陷阱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其家庭非农收入水平,保障了集中安置家庭生计可持续^[21-23]。

后续扶持阶段稳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点在于创造就业机会与降低就业成本。通过空间位置重置、开展技能培训、激发内生动力、完善信贷体系等措施,能有效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群体力非农就业^[3,4]。研究表明,基层政府协助移民群体就业、协调就业岗位在移民搬迁阶段的移民动员、稳定搬迁群众、降低返迁意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4-26]。各地在易地扶贫搬迁时期通过优化集中安置社区选址、引进社区企业、东西部劳务协作、设置公益性岗位等多种形式,为移民群体带来了更多公平选择机会、更多就业机会,促进了劳动力非农就业^[4,5,9]。此外,通过不断提升安置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如不断完善教育、医疗、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治理等领域的公共服务,集中安置群体能以更低非农就业成本实现生计方式的转型^[27]。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对家庭非农就业的大量实证研究也印证了上述分析,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能够有效促进家庭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特别是针对青壮年劳动力、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积极影响^[18-21]。

易地扶贫搬迁具有减贫效应已经获得了政界和学界的共识,大量研究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群体的非农就业问题是提升安置群体可持续生计和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27-29]。非农就业成本的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生活条件改善等因素被认为是影响集中安置群体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30-36],而人力资本禀赋、非农就业机会则被认为是决定安置群体非农就业的主要因素^[9,29,30]。部分研究还发现,分散安置与集中安置对于非农就业促进作用也存在因安置方式不同而导致的政策效应差异,安置家庭人力资源禀赋异质性使得易地扶贫搬迁后生计选择出现分化,且对于非农就业人数和非农就业收入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5]。但不可忽视的是,安置家庭通过非农就业实现生计方式的重构和生计资本的积累,其政策促进非农就业进而实现生计转型的过程,本身就具有较为复杂的逻辑,背后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具有因安置形式而产生的特殊性^[4]。因此,针对集中安置促进安置群体非农就业促进作用应当立足于第一阶段各项措施予以充分讨论,针对政策促进就业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需要结合后续帮扶措施展开分析。基于此,本文将基于原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实践,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态搜寻模型。在此基础上,使用2014—2020年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857户家庭的追踪数据,从非农就业占比和非农就业地点两个维度,验证易地扶贫搬迁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效应,并探讨后续帮扶措施对集中安置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作用机制。科学验证上述问题,对于深入理解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的减贫效应,完善集中安置群体后续扶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分析

理性的集中安置家庭决策者在家庭生计决策中不仅会考虑眼前利益,而且会基于理性预期去判断未来的成本或收益。集中安置后家庭在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间的劳动力配置方式与不同非农就业地点的选择会因居住空间转移需要进行动态调整并追求收益最大化^[37]。基于此,本文参考 Beckert^[38]、Fei等^[39]、Angel^[40]的分析框架,构建集中安置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动态模型,分析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机制。首先选取一个代表性的集中安置家庭,假设其劳动力数量为 n 、所有劳动力具有足够长寿命、对于风险持中性态度且追求非农收入贴现收入最大化。那么,决定非农就业的关键,在于其在搬迁后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或非农就业预期收入现值的大小比较,只有劳动力非农就业收入预期不小于务农收入时才选择非农就业^[41]。

为此,做以下假设:(1)劳动力数量为 n ,家庭务农收入只有农业收入 $n \times w$,用 x 表示农业工资的分布, x 是通过稳态分布的函数 $f(w)$ 表示的非负随机变量,即 $f(w)=np(x \leq w)$;(2)劳动时间是延续的,且每一期的时间均等,用 h 表示,则每期务农收入为 $n \times x \times h$;(3)每期贴现因子是时间长度的函数 $\beta(h)$;(4)存在安置前和安置后两种状态,使用 i 表示移民状态, a 表示家庭未集中安置, b 表示家庭已集中安置。用 $w_a(x)$ 表示未搬迁时务农的预期终身收入现值,则有:

$$w_a(x) = \sum_{t=0}^{\infty} \beta(h)^t \times (n \times x \times h) = \frac{nxh}{1 - \beta(h)} \quad (1)$$

集中安置后,如果家庭决定在安置社区周边继续开展农业生产时,不仅需要面临租赁土地、雇佣劳动力、租赁机械开展农业生产等支出,还需要克服社会关系和集体关系变化导致其农业生产所需资源协调难度增加等因素。因此,假设其在安置社区开展农业生产的成本增加为 Δs ,其他假设保持不变,集中安置后务农的预期终身收入现值 $w_b(x)$,则有:

$$w_b(x) = \sum_{t=0}^{\infty} \beta(h)^t \times (nxh - \Delta s) = \frac{nxh - \Delta s}{1 - \beta(h)} \quad (2)$$

使用 W_i 表示非农就业的预期终身收入现值,以 T_i 表示非农转移成本, W_i 和 T_i 与农业收入 $w_i(x)$ 不相关。假设 W_i 、 T_i 均独立于农业收入 $f(w)$ 。 W_a 与 W_b 、 T_a 与 T_b 中存在由于搬迁带来非农就业预期终身收入限制与非农就业转移成本的动态变动,理性家庭会选择能给家庭带来更大收益的策略,搬迁前后其务农和务工的决策可以通过以下价值函数决定:

$$V_{(x)} = \max[W_i(x), n(W_i - T_i)] \quad (3)$$

假设无论劳动力是否非农就业获得工作的概率均为 $p_i h$ 。当 h 趋于0时,找到工作的概率服从泊松分布,则务工的预期终身收入现值 $W_i - T_i$ 。将 $W_i - T_i = w_i(x)$ 时的解 x_i^* 称为保留工资,在该点上劳动力选择非农就业与务农的预期终身收入无差异^[38]。以 W_a 表示移民搬迁前劳动力非农就业预期终身收入,当且仅当 $W_a - T_a = w_a(x)$,劳动力会选择非农就业。以 W_b 表示集中安置后劳动力非农就业预期终身收入,以 T_a 表示集中安置前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转移成本,以 T_b 表示集中安置后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转移成本。当且仅当 $W_b - T_b \geq w_b(x)$,家庭搬迁后劳动力才会选择非农就业。根据 x_i^* 的含义,集中安置前后保留工资分别为:

$$x_a^* = \frac{nx^*h}{1 - \beta(h)} = n(W_a - T_a) \quad (4)$$

$$x_a^* = \frac{n(W_a - T_a)[1 - \beta(h)]}{h} \quad (5)$$

$$x_b^* = \frac{n(x_b^* h - \Delta s)}{1 - \beta(h)} = n(W_b - T_b) \quad (6)$$

$$x_b^* = \frac{n(W_b - T_b)[1 - \beta(h)] + \Delta s}{h} \quad (7)$$

无论是否搬迁, 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预期收入现值可以表示为如下递归形式:

$$n(W_i - T_i) = \beta(h) \left\{ p_i h E \max[nW_i(x), n(W_i - T_i)] + (1 - p_i h) \times n(W_i - T_b) \right\} \quad (8)$$

将式(5)、式(7)代入式(8)得:

$$\begin{aligned} x_i^* &= n(W_i - T_i) \times \frac{n[1 - \beta(h)]}{h} \\ x_i^* &= \beta(h) \left\{ p_i h E \max[nW_i(x), n(W_i - T_i)] + (1 - p_i h) \times n(W_i - T_i) \right\} \times \frac{n[1 - \beta(h)]}{h} \\ &= np\beta(h) \{ E \max[w_i(x), W_i - T_i], 0 \} \end{aligned} \quad (9)$$

取 $[W_i(x), W_i - T_i]$ 中最大值。继续简化式(9):

$$\begin{aligned} x_i^* &= np\beta(h) \int_0^\infty \max[W_i(x) - (W_i - T_i), 0] df(x) \\ &= np\beta(h) \int_{x_i^*}^\infty \max[W_i(x) - (W_i - T_i)] df(x) \end{aligned} \quad (10)$$

将式(1)、式(8)代入式(10)得:

$$x_i^* = \frac{np\beta(h)}{1 - \beta(h)} \int_{x_i^*}^\infty \max[x - x_i^*] df(x) \quad (11)$$

令终身预期收入的贴现因子 $\beta(h) = e^{-\rho h}$, 由洛必达法则得:

$$\lim_{h \rightarrow 0} \beta(h) = 1 \quad (12)$$

$$\lim_{h \rightarrow 0} \frac{1 - \beta(h)}{h} = \rho \quad (13)$$

假定 h 趋近于0, 将式(12)、式(13)代入式(11), 得到:

$$x_i^* = \frac{np_i}{\rho} \int_{x_i^*}^\infty [x - x_i^*] df(x) \quad (14)$$

在式(14)中, 式中左边项为保留工资, 右边项为劳动力非农就业期望终身收入现值。下一步进行静态比较分析, 研究构建如下函数:

$$H(x_i^*, p_i, \rho) = nx_i^* - \frac{np_i}{\rho} \int_{x_i^*}^\infty [x - x_i^*] df(x) \quad (15)$$

求式(15)偏导数, 得到:

$$H_{x_i^*} = \frac{H(x_i^*, p_i, \rho)}{\partial x_b^*} = 1 + \frac{np_i}{\rho} [1 - f(x_i^*)] > 0 \quad (16)$$

$$H_{p_i} = \frac{H(x_i^*, p_i, \rho)}{\partial p} = -\frac{n}{\rho_i} \int_{x_i^*}^\infty [x - x_i^*] df(x) < 0 \quad (17)$$

$$H_{\rho_i} = \frac{H(x_i^*, p_i, \rho)}{\partial \rho_i} = \frac{np_i}{\rho_i^2} \int_{x_i^*}^\infty [x - x_i^*] df(x) > 0 \quad (18)$$

此时, 比较集中安置前后保留工资变动为:

$$\Delta x_i^* = x_b^* - x_a^* = \frac{n}{\rho_i} [(T_a - T_b + W_b - W_a) \rho_i] [\beta(h) - 1] \quad (19)$$

由式 (12) | 式 (13) 可得:

$$\Delta x_b^* \approx n [(W_b - T_b) - (W_a - T_a)] \rho_i - \Delta s \rho_i \geq 0 \quad (20)$$

由式 (16) ~ 式 (18), 应用隐函数定理可知, 因为 $\frac{\partial x_i^*}{\partial p} = -\frac{Hp}{Hx_i^*} > 0$, 所以保留工资 x_i 是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 p_i 的增函数。非农就业机会越多, 保留工资越高, 劳动力越趋向于非农就业。因此, 当集中安置通过创造就业岗位、协助就业创业, 且 $\Delta x_i^* \geq 0$, 集中安置后获得的就业机会 p_b 将大于搬迁前的 p_a 时, 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时集中安置后保留工资一定高于安置前保留工资。由式 (20) 可知, 就业机会 p_i 和 Δs 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当就业机会增加时, $(W_a - T_a)$ 和 $(W_b - T_b)$ 这两个项之差也会增加, 从而导致右侧的 $n[(W_a - T_a) - (W_b - T_b)]$ 项增加。此时, 家庭在劳动力配置中同样更倾向于基于非农就业机会匹配更多非农就业劳动力。因此, 保留工资变化和非农就业机会变化使得集中安置对于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存在促进作用。

进一步, 考虑 Δs 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的变化的影响。当安置家庭集中安置后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意味着农业生产成本的产生, 此时式 (20) 中 $\Delta s > 0$, 意味着 $\Delta s \rho_i$ 项也会随之增加, 从而导致 Δx_i^* 的估计值减少, 表示该变量的实际值相对于基准状态下变小。如果集中安置后对于能够通过发展农业特色产业脱贫致富的家庭进一步进行农业特色产业扶持, 若家庭能在土地流转、产品加工等环节降低生产成本, 使得 Δs 的增速降低直至 $w_b(x) \geq (W_b - T_b)$ 时, 此时务工务农获得的预期收入相同时劳动力配置如何配置并无差异, 此时集中安置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政策效应会被进一步抵消。基于此,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a1: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

Ha2: 集中安置后提供就业机会能显著促进家庭非农就业占比提升;

Ha3: 集中安置后提供农业产业扶持政策可能抑制家庭非农就业占比提升。

其次, 鉴于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之间的生产效率差异和城市工资溢价^[42], 考虑未来收益贴现率和劳动力技能呈现正相关关系。因为 $\frac{\partial x_i^*}{\partial \rho} = -\frac{Hp}{Hx_i^*} < 0$, $x_a^* < x_b^*$, 所以保留工资 (x^*) 是未来收益贴现率 ρ 的减函数。未来收益贴现率作为对于未来收入期望的考虑, 在安置人口参与政府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获得技能提升后, 其未来收益贴现率将进一步提高^[41], 当家庭搬迁后跨区域就业的未来收益贴现率越大, 且高于搬迁之前预期收入贴现率时, 其跨区域就业与农业生产相等的保留工资就越小, 搬迁后劳动力跨区域就业的意愿越强烈。另一方面, 集中安置社区在安置人口就业创业上的帮扶力度增加, 以及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配套设施进行完善, 使得其非农就业成本、子女受教育成本等 T_b 的各项支出逐步降低^[28]①。考虑集中安置家庭搬迁前后非农就业预期收入相等时, 即 $n(W_a - T_a) = n(W_b - T_b)$, 当 T_b 随着搬迁后进一步降低, 获得与原有非农就业收入预期需要的劳动力要低于左边项 n , 即集中安置会改变劳动力分工现状。加之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主要集中在乡镇内, 而经济较为落后的贫困县区往往产业基础较弱, 就业吸纳能力较弱, 当劳动

①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的通知》, http://www.cpad.gov.cn/art/2017/4/28/art_50_62482.html。

力脱离农业生产进入非农领域^[4],具有追逐更高工资水平的地区就业的冲动,更多选择跨区域就业,以追求更高的工资收入。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b1: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搬迁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

Hb2:集中安置后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能显著促进劳动力外出就业。

1.2 研究方法

1.2.1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

考虑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作2016—2020年逐步推进的渐进性特征,将采用符合搬迁实际的多期DID模型,识别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促进作用的净效应。具体而言,参考搬迁政策的实际情况,本文构建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alpha_1 + A_m \text{immig}_{it} + \chi_{it} + \delta_{it}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1)$$

式中: i 表示第 i 个贫困户; t 代表访谈年份; y_{it} 表示非农就业占比(%)与非农就业地点; α_1 为截距项; A_m 为集中安置的系数; immig 表示集中安置,其具体含义为在2014—2020年间,贫困户是否参与集中安置,其中参与集中安置记为1并纳入实验组,反之则记为0并纳入对照组; χ_{it} 为劳动力特征、家庭其他特征等一系列控制变量; δ_{it} 为个体固定效应,主要控制个体层面诸如能力、偏好在内的不可观测因素; λ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主要控制与搬迁有关的扶贫政策或地方政策调整等随时间变化但不随劳动力变化的因素; ε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1.2.2 作用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为考察集中安置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作用机制,结合前述理论分析,借鉴Zhao等^[43]、江艇^[44]的研究构建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促进作用影响的中介效应模型,具体构建的作用机制检验模型如下:

$$\text{Mov}_{it} = \vartheta_0 + \vartheta_1 \text{immig}_{it} + \chi_{it} + \delta_{it}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3)$$

$$y_{it} = \omega_0 + \omega_1 \text{immig}_{it} + \omega_2 \text{Mov}_{it} + \chi_{it} + \delta_{it}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4)$$

式中: Mov 为中介变量; ϑ_0 、 ω_0 为截距项; ϑ_1 、 ω_1 、 ω_2 为待估系数。

1.2.3 变量选择

因变量: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地点。研究旨在考察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为更清晰分析集中安置的促进作用,且考虑到不同劳动力数量存在差异,单纯非农就业人数难以体现政策对劳动力促进作用,故选取更能体现劳动力非农就业变动的非农就业占比和非农就业地点以表征非农就业促进效应成效^[45,46]。其中,非农就业占比为访谈当年家庭非农就业超过6个月的人数占劳动力数量的比例,非农就业地点为劳动力最远务工地点。同时,针对影响路径的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家庭非农就业人数、非农就业地点变化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家庭非农就业人数、非农就业地点变动通过对照上一年度劳动力非农就业人数、非农就业地点对比本年度非农就业地点的差异进行记录。

核心解释变量:集中安置。利用集中安置的准自然实验将是否搬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问卷中“您是否是集中安置户?”进行识别,并将搬迁安置初始时间设置为2016年,这是根据国务院关于集中安置工作的相关安排确定^②。

② 资料来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伟大成就与实践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106/t20210630_1285081.html)。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自2015年12月正式拉开帷幕,并计划用五年时间完成,调研(县)市于2016年开始易地扶贫搬迁分散安置的工作,因此将2016年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初始年份。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分别控制劳动力变动情况与其他可能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31]。其中家庭劳动力变动情况主要控制其新增人口、新增劳动力情况。家庭其他变动情况主要控制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以及家庭承包耕地面积^[22]。同时，已有研究发现，前期开展的撤点并校导致大量乡村小学撤并，使得有子女受教育的家庭在子女受教育照料上的时间投入增加，进而影响其非农就业^[47,48]。集中安置社区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配套政策可能降低家庭在子女教育中的劳动力投入^[10]。因此，选择家庭受教育子女数量、受教育子女最小年级以控制受教育带来的子女养育投入。

中介变量：农业特色产业扶持、提供就业岗位、提供职业技能培训。首先，政府通过农业特色产业扶持以降低土地流转、产品价格等环节的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进而可能影响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作用，因此选取农业特色产业扶持作为中介变量^[25]。其次，集中安置后通过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就业岗位、组织参与定向劳务派遣等协助就业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就业竞争力，劳动力能够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研究选取组织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中介变量检验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促进作用的影响。最后，集中安置后政府组织参与定向劳务派遣、组织招工会等对接企业招工需求，能够为劳动力提供更多外出就业工作岗位和更高的薪资待遇，可能会影响劳动力务工地点的决策，因此选取组织参与定向劳务派遣、组织招工会次数检验其在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促进作用的影响^[4,5,9]。

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研究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18—2021年开展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创新研究追踪调研。调研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市（州）内选取4个贫困县，在每个样本县中分别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分别抽取4个集中安置社区作为样本社区，并保持样本中小于800人以下的小型安置社区、800~2000人的中型安置社区、大于2000人以上的大型安置社区均有一定比例。在每个中小型安置点根据安置规模随机抽取15~100户家庭、大型安置点随机抽取250户家庭进行访谈和追踪调查。对照组根据集中安置家庭的帮扶责任人，抽取该责任人帮扶的未纳入搬迁的劳动力进行电话访谈。通过以上方式，共选取集中安置实验组劳动力780户，对照组劳动力480户作为初始样本进行追踪调查。根据2019年、2020年、2021年三次调研中拒访、无法联系、访问对象无法清晰回答问题以及户籍调整等实际情况，剔除整户消亡、户籍分家、退出集中安置等跟踪调查信息缺失或无效的家庭数据，共计获得实验组525户、对照组332户劳动力2014—2020年7期共5999份调研问卷。其中，2016年集中安置家庭169户，2017年集中安置家庭192户，2018年集中安置家庭166户。调研问卷包含集中安置情况、家庭基本情况、非农就业情况、子女受教育情况、享受扶贫政策情况及后续帮扶措施、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等。2014—2017年劳动力数据在2018年12月的第一次访谈时根据询问对照查看贫困户档案中留存的扶贫手册表等留存档案并与家庭主要成员确认后记录。

追踪调查数据中，从家庭非农就业平均占比变化看（图1a），2014—2015年，未实施集中安置时，实验组对照组在2014年劳动力非农就业情况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贫困家庭外出务工人口都偏少。2015年对照组非农就业人口占比逐渐增加，而实验组仍少有劳动力非农就业，两组之间的差异快速加大。2015年12月国家正式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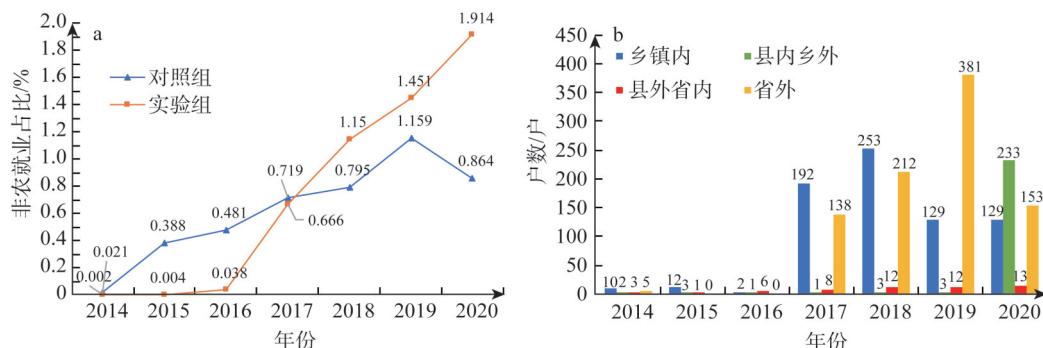


图1 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实验组非农就业占比、非农就业地点变化

Fig. 1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non-farm employment and locations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before and after cent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后，集中安置后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开始显著增长，且保持持续增长趋势。自2016年开始实施集中安置后家庭非农就业占比的平均值由0.038逐渐增长至1.914，并于2017年迅速超过对照组的非农就业占比平均值，在2020年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影响后仍保持相对稳定的家庭就业规模。从非农就业地点分布看（图1b），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的最远就业地点由2014年的乡镇内务工逐渐向省外务工转移，实验组自2017年起快速发生变化，乡镇内务工迅速减少，省外务工迅速增加。2020年受疫情影响省外务工劳动力逐渐向县内乡镇外务工转移，但仍保持相对稳定的就业规模。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多年平均特征描述如表1所示。

2 结果分析

2.1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作用实证分析

2.1.1 基准回归结果

为厘清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作用影响，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进行。第一步仅对集中安置变量纳入式（20）进行回归，再引入家庭劳动力变动情况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最后引入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表2分别汇报了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非农就业地点的回归结果：未加入控制变量时，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加入劳动力变动的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有所增加，且同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纳入全部控制变量后，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仍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提升了近22%。从集中安置对非农就业地点促进作用来看，未加入控制变量时，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加入劳动力变动的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但同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仍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1.665，且同样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从整体来看，集中安置家庭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促进作用提升了近两个范围，即从在村务农向乡镇内务工为基准的两个务工地点调整。

控制变量中，是否有新增人口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和非农就业地点变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析原因在于：家庭新增人口主要以新生人口为主，在当年度出生后释放的劳动力能够逐渐参与非农就业中，进而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和非农就业地点变动存在显著

表1 变量设定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sett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实验组 (N=3675)		对照组 (N=2324)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非农就业占比	当年度家庭非农就业超过6个月的人口数占劳动力数量比例	0.232	0.280	0.169	0.189
外出务工地点	当年度家庭非农就业超过6个月的人口最远务工地点;1=乡镇内、2=县内乡外、3=省内县外、4=省外	1.320	1.633	0.898	1.230
是否集中安置	0=否、1=是	1.000	1.000	0	0
家庭非农就业人数	家庭当年度非农就业人数/人	0.741	0.901	0.632	0.691
非农就业地点变化	较上一年地点变动;1=前往乡镇务工、2=前往县内务工、3=前往省内务工、4=前往省外务工、-1=向下一级、-2=向下两级、-3=向下三级、-4=返乡	0.337	1.338	0.187	0.932
是否有新增人口	家庭是否有新生儿或嫁入人口;0=否、1=是	0.024	0.152	0.027	0.161
新增劳动力数量	家庭因婚姻嫁入劳动力或家庭成员完成教育增加的劳动力数量/人	0.017	0.162	0.019	0.169
受教育子女数量	家庭处于受教育阶段子女数量/人	0.777	0.760	1.098	0.729
无劳动力人口数量	家庭无劳动能力人口数量(包含处于受教育阶段子女)/人	1.115	0.744	1.304	0.685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总人口数/人	3.495	1.336	3.775	1.162
最小受教育子女年级	家庭处于受教育阶段子女最小受教育阶段(其中学前阶段为负数)	3.206	4.887	4.252	4.978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1=健康、2=患有长期慢性病、3=患大病、4=残疾	3.333	0.997	3.419	0.958
实际承包耕地面积	家庭土地确权承包面积/亩(1亩≈667 m ²)	3.710	0.918	10.833	2.462
政府以工代赈项目招工或公益性岗位	劳动力是否参与政府以工代赈项目招工或公益性岗位;0=否、1=是	0.257	0.437	0.371	0.483
政府协助对接企业	政府是否协助劳动力对接企业寻求就业岗位;同上	0.252	0.434	0.075	0.264
是否农业产业扶持	家庭是否享受农业产业扶持政策;同上	0.807	0.394	0.91	0.287
参与职业技能培训	劳动力是否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同上	0.317	0.465	0.189	0.392
参与定向劳务派遣	是否参与企业定向招工或东西部协作劳务派遣;同上	4.363	2.414	2.000	0
参与招工会次数	当年度参与社区组织的招工会次数/次	0.428	0.495	0	0

正向作用。新增劳动力数量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的新增形式由子女成立家庭或子女成年完成教育，在其当年度未就业或投入家庭事务时，会导致家庭非农就业占比降低。劳动力数量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对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变动不显著。分析原因在于，当劳动力越多时能够在劳动力资源分配中更多分配到非农就业中，但劳动力数量越少时，劳动力更趋向于降低务工距离以照料家庭事务。家庭人口总数对非农就业占比影响呈现负向显著。当家庭组成结构中人口数量越少，其家庭组成结构多为夫妻两人或直系两代家庭，更年轻的劳动力和更简单的家庭结构能够降低家庭事务投入的劳动力数量，也意味着投入农业生产

表2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作用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of cent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non-farm employment of household labor force

变量	非农就业占比			非农就业地点		
	(1)	(2)	(3)	(4)	(5)	(6)
集中安置	0.227*** (-29.16)	0.229*** (-29.22)	0.228*** (-29.63)	1.658*** (-29.83)	1.656*** (-29.77)	1.665*** (-29.99)
是否有新增人口		0.071*** (-5.66)	0.078*** (-5.99)		0.098 (-1.16)	0.153* (-1.73)
新增劳动力数量		-0.078*** (-4.97)	-0.057*** (-2.92)		-0.109 (-0.94)	-0.119 (-1.14)
劳动力数量		0.138*** (-6.17)	0.150*** (-6.40)		-0.184** (-1.99)	0.135 (-1.28)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0.001 (-0.08)			-0.185 (-1.07)
家庭人口总数			-0.077*** (-5.07)			-0.106 (-1.02)
受教育子女数量			-0.004 (-0.57)			0.302*** (-6.28)
受教育子女最小阶段			-0.004** (-1.99)			0.052*** (-4.47)
实际承包耕地面积			0.002 (-0.33)			0.051* (-1.74)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户	5999	5999	5999	5999	5999	5999
调整的R²	0.700	0.705	0.707	0.694	0.695	0.699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的劳动力存在刚性约束，进而使得劳动力能够多投入非农就业中^③。受教育子女数量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子女最小阶段对非农就业占比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非农就业地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原因在于，受教育子女数量较多会进一步增加家庭赡养负担，承担子女教育和生活开销需要更高收入，进而促进其非农就业和外出务工。但受教育子女受教育阶段越低，家庭可能投入劳动力伴读或照顾子女，其他劳动力最远就业地点可能由于子女赡养负担而前往更高薪资水平的地区务工以获得更高收入。

2.1.2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图2汇报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从政策实施相对时间和政策动态效应来看，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非农就业占比和非农就业地点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且政策实施前置信区间均包含0，表明拒绝原假设，平行趋势假设总体成立。

③ 家庭人口变动在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具有多方面因素，一是在新增人口出生后当年度，部分家庭能够释放部分劳动力（如孕妇、丈夫），这一人群在新生儿出生后可以参与到非农就业中，并且可能选择外出务工；二是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使受教育人口在完成教育后未完全就业，导致当年度家庭劳动力总量增加的情况下非农就业占比减少。

同时,从政策促进效应来看,在集中安置家庭易地扶贫搬迁当年度,集中安置带来的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效果开始显现。图2a中汇报了集中安置对非农就业占比促进作用的政策效应。随着易地扶贫搬迁相对时间增加,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的促进作用一直存在。其中,集中安置实施当年,集中安置的政策效应转为正向促进作用,政策实施第二年起政策促进效应逐步提高。图2b中汇报了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变动存在正向促进作用的政策效应,政策实施当年至第一年集中安置即存在非农就业地点向外转移就业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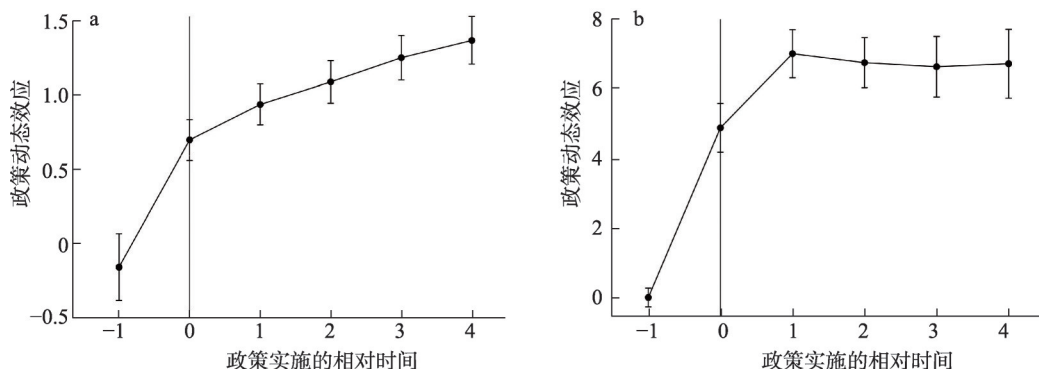


图2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作用平行趋势检验

Fig. 2 Parallel trend test of the effect of cent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non-farm employment of household labor force

(2) 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干扰。为更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于2016年12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④,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中,组织劳务协作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要工作之一。为排除可能性干扰,本文在原有模型设置中添加上述政策的虚拟变量进行回归。表3回归估计结果显示,与表2回归系数相比,东西部劳务协作对于集中安置家庭非农就业的政策效应有一定削减,但集中安置对非农就业仍存在积极作用。

2.1.3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排除研究的实证结论并非偶然性事件所致,通过随机抽取控制组与对照组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由于“伪”处理组为随机生成的,因此是否搬迁变量应该不会对家庭非农就业人数与非农就业地点产生影响,即“伪”处理变量的回归系数应当在零点附近。若回归系数不在零点附近,则表明研究的模型设定存在偏差。据此,在控制控制变量以及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分别重复500次上述随机过程进行模型估计。安慰剂结果表明,在重复500次上述随机过程下估计系数均值均接近于0,且大多数 p 值大于0.1,拒绝了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结果与真实估计结果不存在差异的原假设。表明研究的估计结果不存在偏差,不太可能受到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⑤。

④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室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6-12/07/content_5144678.html.

⑤ 除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外,本文还增加了控制变量、绘制了核密度图、同时还进行了调整聚类、更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上述检验均表明集中安置对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和非农就业地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限于篇幅文章并未予以展示,如有需要可向课题组索要。

2.2 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分析

2.2.1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首次非农就业促进效应的影响路径分析

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和非农就业地点的促进作用可能存在以下影响路径：一是通过集中安置、提供就业岗位和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更多劳动力非农就业，提升家庭非农就业人数；二是通过集中安置、提供就业岗位和对接就业岗位促进劳动力逐步由本地务工向跨区域务工转移。因此，为更好地评估集中安置、提供就业岗位和降低非农就业成本对劳动力非农就业人数变化与非农就业地点变化的影响路径，使用政策实施前无务工经历的样本，选择非农就业占比、地点变化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政府以工代赈招工、政府协助对接企业组为被解释变量分别纳入式（21）进行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表4），集中安置对易地扶贫搬迁前无务工经历家庭的家庭非农就业人数、非农就业地点变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通过政府以工代赈项目招工的形式提供就业岗位对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非农就业地点变动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即政府以工代赈项目招工能够有效提升家庭非农就业人数，但由于政府提供就业大多在乡镇或县域内，因此享受以工代赈或公益性岗位的劳动力多趋向于本地就业。政府协助就业同样提升了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和非农就业地点变化。通过政府帮助劳动力对接就业岗位使得集中安置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地点发生正向变化。这进一步佐证了理论分析中的理论预期。假设Hb1得到进一步验证。

2.2.2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作用的作用机制检验

基于前述理论分析，考虑到组织技能培训和农业特色产业扶持分别提升其人力资本能力与影响其非农就业劳动力配置，因此选择农业产业扶持政策和组织职业技能培训验证其非农就业占比的影响。而组织定向劳务派遣、组织招工会则是面向集中安置群体提供就业岗位，企业招工可能改变其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特别是定向劳务派遣可能会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就业，因此对非农就业地点变动影响可能更大。基于此，将所有变量分别放入中介效应模型中对四个政策措施的机制效应进行检验。表5汇报了产业扶持政策与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在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促进作用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由列（1）~列（2）可知，集中安置对农业产业扶持政策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将农业产业扶持政策和集中安置同时放入模型后，农业产业扶持政策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当劳动力在集中安置后继续参与村内产业发展，享受政府产业扶持时，会进一步降低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的促进作用。因此，农业产业扶持政策部分抑

表3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作用
稳健性检验：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干扰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of the effect of cent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non-farm employment of household labor force:
Excluding other policy interference in the same period

变量	因变量:非农就业占比	因变量:非农就业地点
	(1)	(2)
集中安置	0.208*** (-26.79)	1.624*** (-29.10)
东西部劳务协作	0.214*** (-21.77)	0.452*** (-8.26)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样本数/户	5999	5999
调整的R ²	0.748	0.704

注：① 控制变量为劳动力特征和家庭其他特征，估计结果略；② 已控制劳动力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略。下同。

表4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作用影响路径实证分析结果

Table 4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impact path of cent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promotion of non-farm employment of household labor force

变量	(1)	(2)	(3)	(4)	(5)	(6)
	家庭非农就业 人数	家庭非农就业 人数	家庭非农就业 人数	非农就业地点 变化	非农就业地点 变化	非农就业地点 变化
集中安置	0.687*** (25.040)			0.827*** (0.035)		
政府以工代赈项目 招工		0.530*** (17.840)			-0.874*** (0.051)	
政府协助就业			0.165*** (27.740)			2.240*** (0.04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社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户	5068	5068	5068	5068	5068	5068
调整的R ²	0.730	0.719	0.747	0.308	0.323	0.544

注：已控制劳动力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社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略。下同。

制了集中安置提升家庭非农就业占比的政策效应。Ha3 假设得到检验。由列（3）~列（4）可知，集中安置对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集中安置、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放入模型后，集中安置对非农就业占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回归系数显著降低，表明集中安置有效促进了劳动力参与政府为其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当劳动力在集中安置后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后，会进一步促进其非农就业。因此，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在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提升中发挥着中介效应机制作用。Hb2 假设得到检验。

进一步探讨组织定向劳务派遣、组织参与招工会在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变化的促进过程中发挥的机制效应。表6汇报了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机制分析实证结论。由列（1）~列（2）可知，集中安置对组织定向劳务派遣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将集中安置、组织定向劳务派遣同时放入模型中回归发现，组织定向劳务派遣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存在显著正向作用，但回归系数有所降低。表明组织定向劳务派遣在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促进作用中存在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由列（3）~列（4）可知，集中安置对劳动力参与招工次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将集中安置、组织招工次数同时放入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中回归发现，组织招工次数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回归系数有所降低，表明组织招工次数在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促进作用中存在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及其内在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2014—2020年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集中安置家庭作为研究样

表5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促进作用机制分析

Table 5 Mechanism analysis of cent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contributing to share of non-farm employment to household labor force

变量	(1)	(2)	(3)	(4)
	农业特色产业扶持	非农就业占比	组织职业技能培训	非农就业占比
集中安置	-0.085** (-1.98)	0.072*** (5.29)	0.173*** (4.08)	0.083*** (4.55)
农业特色产业扶持		-0.248*** (-19.27)		
组织职业技能培训				0.055*** (6.2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社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户	5999	5999	5999	5999
调整的R ²	0.608	0.892	0.644	0.846

表6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促进作用机制分析

Table 6 Mechanism analysis of cent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contributing to location changes in non-farm employment of household labor force

变量	(1)	(2)	(3)	(4)
	参与定向劳务派遣	非农就业地点	参与招工会次数	非农就业地点
集中安置	0.457*** (33.83)	0.953*** (7.54)	3.932*** (24.04)	0.929*** (6.66)
组织定向劳务派遣		0.360*** (5.26)		
组织招工会次数				0.048** (2.1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社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户	5999	5999	5999	5999
调整的R ²	0.863	0.725	0.926	0.724

本,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验证了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促进作用、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集中安置政策有效提升了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和跨区域就业。集中安置对家庭非农就业占比提升了近22%,并随着安置相对时间的延长政策效应进一步扩大。集中安置显著促进了家庭劳动力的跨区域就业,且在政策实施第一年起就对跨区域就业开始存在促进作用。

(2)影响路径分析发现,集中安置及后续扶持政策有效促进了搬迁前无务工经历家

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和非农就业地点变动。后续扶持政策中政府以工代赈项目招工、政府协助对接企业有效提高了搬迁前无务工经历家庭非农就业人数。但不同扶持政策对无务工经历家庭非农就业地点变动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政府协助就业有效促进了无务工经历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变动,而政府以工代赈项目招工则由于提供就业岗位地点限制对非农就业地点变动呈现负向影响。

(3) 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在集中安置对非农就业占比的促进作用机制中,农业特色产业扶持在集中安置促进家庭非农就业占比提升中存在中介效应。在集中安置政策实施后,若集中安置家庭移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政府提供农业特色产业扶持会降低家庭非农就业占比。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在集中安置促进家庭非农就业占比的促进作用中发挥着中介效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可以有效提升劳动力的资源禀赋,能有效提升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在集中安置对非农就业地点的促进作用机制中,组织定向劳务派遣、组织招工次数在集中安置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变动的政策效应中发挥着中介效应机制作用,通过劳务派遣、组织招工会进一步提升劳动力跨区域就业。

3.2 讨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在后易地扶贫搬迁时期,稳定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1) 稳定集中安置家庭非农就业规模和收入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除根据不同规模社区分类促进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就业外,建议各地在统筹规划中针对集中安置社区基于现有帮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集中安置群众就业治理的指导和资金支持,着力促进搬迁群众就业创业。(2) 着力推动大中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推进产业园区安置区产城融合发展,促进农村安置区城乡融合发展,着力扶持壮大县域特色产业,稳定集中安置社区就业规模。(3) 集中安置带来的非农就业促进效应较为显著,且随着搬迁时间的拉长效应逐步显现。建议地方政府在后续帮扶阶段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提升投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以提升劳动力竞争能力,通过强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开展东西部产业协助等措施,缓解县域就业岗位不足导致的就业压力。(4) 建议关注集中安置家庭中的生计分化问题,特别是在搬迁后期“拆旧复垦”带来的生计转型阶段生计脆弱、返贫风险增加的问题。集中安置前期工作全面完成,家庭异质性带来的生计转换需要政府与基层组织予以分类帮扶^[49,50]。针对部分集中安置后继续开展农业生产的安置家庭,应当进一步加大农业特色产业扶持力度,帮助其通过融入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现代农业等形式增收致富。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檀学文. 中国移民扶贫70年变迁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8): 2-19. [TAN X W. The evolv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resettled people in 70 years: From 1949 to 2019.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 (8): 2-19.]
- [2] 刘明月, 冯晓龙, 张崇尚, 等. 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 中国农村观察, 2022, (5): 61-79. [LIU M Y, FENG X L, ZHANG C S, et al.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relocation. China Rural Survey, 2022, (5): 61-79.]
- [3] 郭占锋, 张森, 李铁星. 中国扶贫移民40年: 轨迹、经验与展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0(5): 37-47. [GUO Z F, ZHANG S, LI Y X. Forty year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relocation in China: Tiack,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20(5): 37-47.]
- [4] 陈菲菲, 张祎彤, 仇焕广. “挪穷窝”后如何实现平稳过渡? 基于疫情冲击下易地扶贫搬迁户就业治理的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2, (2): 48-59. [CHEN F F, ZHANG Y T, QIU H G. How to ensure a smooth transition after "Moving Out of Poor Areas"? A study based on the employment governance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during the COVID-19 Pan-

- demic.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2022, (2): 48-59.]
- [5] 时鹏,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内生转换 Probit 模型. *农业技术经济*, 2023, (4): 101-120. [SHI P, YU J.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rural household's off-farm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switching Probit model.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3, (4): 101-120.]
- [6]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3/22/content_5594969.htm, 2021-03-22.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pinions on effective linkage between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poverty reduction achievements and rural revitalisation,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3/22/content_5594969.htm, 2021-03-22.]
- [7]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切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指导意见, https://www.ndrc.gov.cn/fzggw/jgsj/zxs/sjdt/202003/t20200302_1222108.html, 2020-03-02.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iding opinions on effectively doing a good job in follow-up suppor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ttps://www.ndrc.gov.cn/fzggw/jgsj/zxs/sjdt/202003/t20200302_1222108.html, 2020-03-02.]
- [8]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28/content_5738973.htm, 2023-01-28.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iding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large-scale relocation area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to new urbanisation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28/content_5738973.htm, 2023-01-28.]
- [9] 罗蓉, 曹波, 王志凌, 等. 可行能力、期望确认度与易地搬迁户非农就业意愿: 来自民族地区的微观调查.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3, 45(7): 32-44. [LUO R, CAO B, WANG Z L, et al. Viability, recognition of expectations and willingness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to engage in non-farming employment micro-surveys from ethnic minority areas.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3, 45(7): 32-44.]
- [10] 武汉大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课题组. 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特征与后续扶持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12): 88-102. [Research Group of Wuhan University on Follow-up Support for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ath selections of the follow-up support.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 (12): 88-102.]
- [11] 杨菊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2): 61-79, 203-204. [YANG J H. Research on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5, (2): 61-79, 203-204.]
- [12] CERNEA M. The risks and reconstruction model for resettling displaced populations. *World Development*, 1997, 25 (10): 1569-1587.
- [13] WILMSEN B, HULTEN A V. Following resettled people over time: The value of longitudinal data collec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livelihood impacts of the Three Gorges Dam, China.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2017, 35(1): 94-105.
- [14] 仇焕广, 冷淦潇, 刘明月, 等. 中国千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 理论、政策与实践. 北京: 经济出版社, 2021: 159-161. [QIU H G, LENG G X, LIU M Y, et al. China's Relocation of Millions of people: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Beijing: Economic Press, 2021: 159-161.]
- [15] 郑娜娜, 许佳君.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融入: 基于陕西省西乡县的田野考察.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19(1): 58-68, 165. [ZHENG N N, XU J J. Migrant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of Xixiang county in Shanxi.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19(1): 58-68, 165.]
- [16] 渠鲲鹏, 左停. 协同治理下的空间再造. *中国农村观察*, 2019, (2): 134-144. [QU K F, ZUO T. Space reconstruction un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hina Rural Survey*, 2019, (2): 134-144.]
- [17] 樊晔, 任志军. 脱贫攻坚背景下宁夏生态移民劳动力转移实证研究.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 67-73. [FAN Y, REN Z J. Empirical study on labor transfer of ecological migrants in Ningx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vercoming poverty. *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9, (5): 67-73.]
- [18] 张翠娥, 陈子璇. 家庭负担、性别分工与贫困劳动力就业: 基于湖北J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调查.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 32-39, 175-176. [ZHANG C E, CHEN Z X. Family burden,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of poor labor: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in J county, Hubei. *Journal of Huazhong Ag-*

- 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2): 32-39, 175-176.]
- [19] 张会萍, 石铭婷.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 基于宁夏“十三五”不同安置方式的女性移民调查. 宁夏社会科学, 2021, (3): 163-178. [ZHANG H P, SHI M T. A study on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female migra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inhospitable areas: On the female migration survey of different resettlement modes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 Ningxia. Ningxia Social Sciences, 2021, (3): 163-178.]
- [20] 朱永甜,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陕南三市1680份农户数据. 资源科学, 2021, 43(10): 2013-2025. [ZHU Y T, YU J.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farmers' income and income gap: A case study of 1680 households in Southern Shaanxi.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10): 2013-2025.]
- [21] 时鹏, 王倩,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及效应: 基于陕南3市8县1712个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地理, 2022, 42(2): 190-202. [SHI P, WANG Q, YU J. The impact of ex 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712 households' data in 8 counties of 3 municipalities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2): 190-202.]
- [22] 宁静, 殷浩栋, 汪三贵, 等.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11): 20-28. [NING J, YIN H D, WANG S G, et al. Doe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reduce poverty vulnerability.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 28(11): 20-28.]
- [23] 马明, 陈绍军, 陶思吉, 等.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以云南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为例.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8): 1-10. [MA M, CHEN S J, TAO S J, et al. Livelihood strategy, livelihood capital and family income of immigrants involv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 deeply impoverished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1, 35(8): 1-10.]
- [24] 刘欢. 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减贫效应分析: 基于健康、教育、社会保险、外出务工比较视角. 经济经纬, 2017, 34(5): 43-48. [LIU H. An analysis of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n rural poor famili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health, education, social insurance and working away from hometown. Economic Survey, 2017, 34(5): 43-48.]
- [25] 吕建兴, 曾小溪, 汪三贵. 扶持政策、社会融入与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返迁意愿: 基于5省10县530户易地扶贫搬迁的证据.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19(3): 29-40, 156. [LYU J X, ZENG X X, WANG S G. Supportive policy, social integration and willingness of returning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530 households in ten counties of five provinces.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19(3): 29-40, 156.]
- [26] 王武林, 冯浩铭, 纪庚.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老年人养老保障水平及供给框架研究. 人口研究, 2021, 45(5): 79-90. [WANG W L, FENG H M, JI G. A study on living security and supply framework for the older adul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areas. Population Research, 2021, 45(5): 79-90.]
- [27] 张晨, 马彪, 仇焕广. 安置方式、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 来自中国8省(区)16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证据. 中国农村观察, 2022, (4): 153-169. [ZHANG C, MA B, QIU H G. Resettlement types, social distanc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relocated poverty relief households in 16 counties of 8 provinces in China. China Rural Survey, 2022, (4): 153-169.]
- [28] 王蒙. 公共性生产: 社会治理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发展机制.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37(3): 77-87. [WANG M. Production of the publicity: Follow-up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he 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37(3): 77-87.]
- [29] 张晨, 张正岩, 马彪. 如何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 基于社交距离视角的分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2(6): 90-101. [ZHANG C, ZHANG Z Y, MA B. How to promot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splaced househol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istance.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22(6): 90-101.]
- [30] 孙晶晶, 黎洁.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非农就业与耕地撂荒: 就业区域还是就业质量重要?.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10): 2536-2553. [SUN J J, LI J.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farmland abandonment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mployment area or employment quality more important?.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10): 2536-2553.]
- [31] 高博发, 李聪, 李树苗.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 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经济地理,

- 2022, 42(4): 168-177. [GAO B F, LI C, LI S Z.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y,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livelihood risks of anti-poverty relocated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Shaanxi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4): 168-177.]
- [32] 李聪, 王磊, 康博伟, 等. 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39(4): 38-47. [LI C, WANG L, KANG B W, et al.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elocated migrants.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39(4): 38-47.]
- [33] 滕祥河, 卿赞, 文传浩. 非自愿搬迁对移民职业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三峡库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3): 97-117. [TENG X H, QING Y, WEN C H. The effect of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on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 (3): 97-117.]
- [34] LENG G X, FENG X L, QIU H G. Income eff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gram on rural farmers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21, 20(4): 891-904.
- [35] 王君涵, 李文, 冷淦潇, 等.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 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10): 143-153. [WANG J H, LI W, LENG G X, et al.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of poor households.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0(10): 143-153.]
- [36] 吴嘉莘, 熊吉安, 杨红娟.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对生计的影响研究. 中国软科学, 2022, (4): 129-138, 148. [WU J X, XIONG J A, YANG H J. Study on the impact of farmers' poverty-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livelihood in minority areas based on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China Soft Science*, 2022, (4): 129-138, 148.]
- [37] 南希 L. 斯托基, 罗伯特 E. 卢卡斯. 经济动态的递归方法.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1-35. [NANCY L S, ROBERT E L. *Recursive Methods in Economic Dynamics*.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9: 1-35.]
- [38]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 家庭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BECKERT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8.]
- [39] FEI J, RANIS G.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The Economic Journal*, 1967, 77(306): 480-482.
- [40] ANGEK DE LA FUENTE. 经济数学方法与模型.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75-135. [ANGEK D L F. *Mathematical Methods and Models for Economists*.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2003: 75-135.]
- [41] 程名望, 史清华, 潘烜.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动态搜寻模型与实证分析. 管理评论, 2013, 25(1): 3-8, 15. [CHENG M W, SHI Q H, PAN X. Empirical analysis on rural labor migration based on dynamic job search model. *Management Review*, 2013, 25(1): 3-8, 15.]
- [42] 胡雯, 张锦华. 城市的力量: 农民工层级迁移与工资溢价. 财经研究, 2021, 47(2): 4-18. [HU W, ZHANG J H. The power of cities: Hierarchical migration and wage premium of migrant workers.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1, 47(2): 4-18.]
- [43] ZHAO X S, JOHN G L J, CHEN Q M. Reconsidering Baron and Kenny: Myths and truths about medi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0, 37: 197-206.
- [44]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5): 100-120. [JIANG T. Mediating effects and moderating effects in causal inference.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2, (5): 100-120.]
- [45] BARRETT E K. The incidence of U. S. agricultural subsidies on farmland rental r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9, 117(1): 138-164.
- [46] 耿鹏鹏, 檀竹平, 罗必良. “挤出”抑或“吸纳”: 农机服务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4): 24-37. [GENG P P, TAN Z P, LUO B L. "Squeezing out" or "absorption": How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affect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4): 24-37.]
- [47] SOUKSAVATH B, NAKAYAMA M.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velihood of resettlers from the Nam Theun 2 Hydropower Project in Lao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2013, 29(1): 71-86.
- [48] 张川川, 王玥琴. 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投入与教育不平等. 管理世界, 2022, 38(9): 83-97. [ZHANG C C, WANG Y Q. Education burden reduction, family education inputs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

(9): 83-97.]

- [49] LI C, GUO M, LI S, et al. The impact of the anti-poverty relocation and settlement program on rural households'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Western China.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4(1): 40-59.
- [50] 赵忠旭, 潘影, 张燕杰, 等. 易地扶贫搬迁对西藏典型迁入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7): 1815-1828. [ZHAO Z X, PAN Y, ZHANG Y J, et al.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ypical immigrated village in Tibet.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7): 1815-1828.]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non-farm employment of household labor force and its mechan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7th-phase tracking data of 857 farmers in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of Wuling Mountain

HOU Xue-bo, LI Xian-kang, ZHANG Bang-B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cent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promotion of non-farm employment of household labor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mechanism model. On this basis, using the tracking data of 857 households in the contiguous areas of dire poverty in the Wuling Mountain from 2014 to 2020, we empirically verified the promotion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cent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non-farm employment of labor forc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cent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non-farm and cross-regional employment of households. The government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changes in the location of non-farm employment of households without non-farm experience by providing job positions and assisting in matching with enterprises for employment and other measure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support of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the provision of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targeted labor dispatch,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recruitment meetings have mediating effects in the policy of cent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 raising the share of households in non-farm employment.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support should be carried out for different relocated groups in a different way, a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abilize the employment scale of relocated groups. Public servic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follow-up support policies should be combined to help the relocated groups achieve economic benefits more quickly.

Keywords: cent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non-farm employment costs; non-farm employment;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multistage DID